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 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蔡 斐

(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学术史的回顾来看,也存在体量上研究根据地工作的多,研究大后方工作的少;对象上研究《新华日报》的多,研究其它方面的少;角度上从新闻宣传工作展开的多,从新闻舆论工作展开的少等问题。目前,条件上已经满足系统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1-002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103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项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扎根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烽火中,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在广袤的抗战大后方发挥着舆论引导、宣传动员、揭露残暴和讴歌胜利的伟大历史功能,为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历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将“勿忘历史”“研究历史”“反思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这一领域产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随着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取代了以往惯称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新的历史坐标,同时也催生着相关研究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因此,从新的理论高度来重新审视、仔细梳理和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就成为一名重要的学术使命。

为充分把握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框架思路和努力方向,本文在此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并加以归纳总结,提出个人见解,以供学界讨论批判。

收稿日期:2018-12-16

作者简介:蔡斐(1982—),男,江苏东台人,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新闻传播史学。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1937—1945)”(16BXW008);2018年重庆市社科规划抗战工程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2018ZDKZ02)

一、体量上研究根据地工作的多,研究大后方工作的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从区域上划分,主要集中在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大后方。前者以延安为中心,以《解放日报》为代表,属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范畴;后者以重庆为中心,以《新华日报》为代表,属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范畴。两者同样接受党的领导,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对比相关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体量上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代表作有:《延安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述评——以延安〈解放日报〉整改为中心》(陈瑛,1998)、《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对中国新闻史的意义》(王春泉,200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赵小军,200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1938——1945)》(田建平等,2010)、《烽火信使——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王传寿,2010)、《中国解放区报业图史》(吴锡恩,2011)、《延安时期“新闻执政”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韩隽,2012)、《渊源与化变: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体系及其当代价值之研究》(李晓灵,201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田建平等,201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杨忠虎,2016)。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林之达,1990)、《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2001)、《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郑保卫,2004)、《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2014)、《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王润泽,2015)等宏观研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在篇幅上也大大超过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某些研究甚至出现了以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替代战时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情形。

这种“多”与“少”的明显对比,从1985年在重庆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到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再到2015年在北京召开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均有类似的体现。1985年的会议上,有《延安〈解放日报〉是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嘹亮号角》(岳颂东,1985)、《对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的回忆》(王闾西等,1985)、《抗战时期的〈淮南日报〉》(雷勃,1985)、《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导报〉》(宋文清,1985)等反映各个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多篇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却只有关于《新华日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华西晚报》《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等不多的几篇。2005年的会议上,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只有《从重庆〈新华日报〉的广告经营看其商业化经营模式》(吴果中,2005)、《浅析抗战时期〈救亡日报〉桂林版新闻评论的选题特色》(刘晓慧,2005)2篇。2015年的会议上,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只有《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发行》(王晓岚,2015)1篇。

出现此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人心,在它领导下开辟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铅印、油印、石印以及手抄的报刊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本来偏僻落后的县城肤施很快成了先进的抗日指挥中心延安市,它也是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2]因此,历史丰富的抗日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就不足为奇了。第二,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新华日报》能够在重庆公开出版,但是其主办者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却并未取得合法地位,“不被允许在国统区发展组织,长期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亦出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有意淡化了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鲜明意识形态的宣传。”^[3]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许多报刊只能以中间姿态出现,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

工作在抗战大后方的新闻体量上并不占据主导优势。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新闻舆论工作模式在1949年建国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解放日报》的办报模式被广泛地普及和运用,延安模式中的党性原则得到了传承,《新华日报》所积累下的城市办报经验却被弱化了。”^[4]所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得不到学界重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对象上研究《新华日报》的多,研究其它方面的少

《新华日报》在抗战大后方的公开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言论钳制,是“破天荒的大事”。“这张报纸的发行,使中共在宣传上、在政治斗争上,以及在后来的发展诸方面,均有显著深刻的影响”^[5]。就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职要务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公开发行的唯一报纸,《新华日报》“成了代表共产党每日向国统区人民讲话的主要工具”^[6],扮演了“新华军”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新华日报》除了担负党的宣传者和鼓动者之外,还将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党报理论演绎到抗战大后方的党建工作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党的领导机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的研究相当丰富。第一类研究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和报史编撰,如《〈新华日报〉的回忆》(编委会,1979)、《〈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石西民等,1983)、《〈新华日报〉史(1938-1947)》(韩辛茹,1990)、《〈新华日报〉史新著》(廖永祥,1998)。这些研究记载了《新华日报》的办报历程和报人的心路轨迹,弥足珍贵。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关注到《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和历史功绩,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反法西斯宣传研究》(奚冬梅,2006)、《试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经营管理》(刘洪,2009)、《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王永恒,2009)、《〈新华日报〉对国统区舆论的建构和消解》(马娟,2010)、《〈新华日报〉社论的话语分析》(费富玲,2014)、《重庆版〈新华日报〉通讯报道的变革路径研究(1938-1947)》(钱汪胜,2014)、《圣地与热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形象的呈现》(曹大伟,2017),这些研究让《新华日报》的历史面目和价值贡献更加深入化、多元化、清晰化。第三类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华日报》与党组织的关系,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如《血与火的斗争——〈新华日报〉营业部纪实》(左明德,2000)、《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研究文集》(廖永祥,2005)、《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17)。此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87)和《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等档案史料的汇编,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新华日报》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主体的嬗变。1983年3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随后,重庆(1983年7月)、成都(1983年7月)、广州(1984年6月)、南京(1985年6月)、武汉(1986年12月)等地纷纷成立分会。史学(分)会一方面定期编印出版会刊,一方面着手推进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为《新华日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之后,硕士研究生成为《新华日报》研究的主力军。硕士论文从主题和篇幅上能够对《新华日报》开展某一方面相对集中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是《新华日报》研究的深化;二是对比研究的涌现。一方面是不同的办报主体的比较研究,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舆论宣传研究》(曹炎,2011)、《〈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抗战规范动员比较》(刘菁,2016)、《〈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报道研究》(钟新等,2017)、《〈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同题新闻抗日话语分析》(肖燕雄,2017);另一方面是相同主体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如《党报的另一种传统——延安《解放日报》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比较及不同命运》(伍静,2015)、《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陈晓静,2016)。比较研究的出现,可以有效地通过“求同”“求异”来发现历史的多样性

和统一性,也凸显出《新华日报》重要的历史价值。

或许是《新华日报》太过突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其它方面着墨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群众》周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救亡日报》以及大后方中共新闻人,如范长江、熊瑾玎、石西民、乔冠华、龚澎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多个省份,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均有媒体布局^[7],并通过直接领导、间接掌控、外围影响等不同方式灵活地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其中的许多方面,不仅没有被系统研究,甚至有不少情况已经被岁月尘封,这实际上也表明了进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角度上从新闻宣传工作展开的多,从新闻舆论工作展开的少

“在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将新闻宣传工作与党的总路线、抗战救国的民族使命统一起来,自觉担负起以笔为枪、新闻救国和舆论动员的光荣使命。”^[8]在2018年这篇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事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作者依然采用了“新闻宣传工作”的说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历史中,“新闻宣传长期占据着重要位置,也发挥过重要作用”^[9],其概念起源于1929年6月的中共六届二次全会,并在1989年李瑞环、江泽民先后做了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讲话后,逐渐盛行并成为官方对“新闻工作”的统一提法,并影响着学界的概念使用。

因此,“宣传”“新闻宣传”“新闻宣传工作”也就一直以来成为了学界观察抗战时期新闻工作的角度,有时候甚至直接成为研究对象。检索中国知网系统(CNKI)发现,类似的论文就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办报活动与宣传策略》(王晓岚,199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兰州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期刊〈甘院学生〉小记》(秋帆,2001)、《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工作简论》(罗存康,2007)、《充分发挥报纸刊物的宣传作用 激发大后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论周文抗战初期对成都报刊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王莹,2010)、《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宣传工作研究》(王欣媛,2010)、《抗战时期大后方青年宣传工作研究——以〈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为例》(周艺,2015)、《抗战时期毛泽东面向国外媒体宣传中共形象的策略——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为中心的考察》(代红凯,2015)、《左中右三报的抗日宣传比较研究——以广州战役、太平洋战争为例》(肖燕雄,2015)、《抗战时期中共媒体形象的塑造——以党报党刊的宣传报道为中心》(张卫波,2016)、《论吴玉章在大后方的抗日宣传与活动》(吴达德,2018)……这些研究,呼应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也成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参考。

从“新闻宣传工作”到“新闻舆论工作”的话语转变,并不是意味着新闻宣传观念的消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新闻宣传工作”的提法还会存在,但是,这种转变揭示的却是“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即随着新闻传播规律的回归与倡导,特别是媒体格局和舆论格局的激烈巨变,党的新闻工作必须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从“新闻宣传工作”走向“新闻舆论工作”,既要主张旗帜鲜明的显性宣传,也要注重看不见的隐性宣传,并将宣传强调的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转变到舆论突出的上下通达、左右互动的交互传播、圈层传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张瑾,2015)是上述转变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全书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提供战时信息、评论时局等多种新闻报道形式传播其观点主张,加之中共主要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宣传艺术,使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能够蕴育于新闻事实和意见领袖的文化领导力中,建构起中共独立自主的舆论话语体系”^{[11]25}。作者在后记中写道,“2008

年,我主持申报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获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这是一项开创性的课题,我们试图突破一般的新闻史论研究的束缚,努力从选题创新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的阐释框架,并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中共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由弱到强的发展与变迁,获得了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新认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应用了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党报宣传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探索。”^{[11]418}

角度转变带来的价值,也让上述研究在新闻史学研究方面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理论课题,“它可以为当今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党报党刊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一定启示”^{[11]5}。的确,无论是战时的大后方,还是当下的新时代,复杂的舆论环境都给我党的新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既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要努力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成功做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努力方向。那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来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也就必然成为该课题“活在当下、服务当代”最重要的价值支撑点。尽管“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成为中共办报的唯一模式”^{[12]16},但是,“大众传播意义上的《新华日报》灵活适应城市环境、尊重新闻客观规律、倡导专家办报、党性与人民性并重的传统却是不容抹杀的,在这一点上,相比《解放日报》它更具有时代的传承意义。”^[3]

四、条件上已经满足系统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需要

《抗战时期党在大后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秦文志,2010)是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绕不过的一份重要成果。该书是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抗战时期党在大后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现。从学术史来看,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项目的立项,也代表了国家对于抗战时期党在大后方新闻工作重要价值的确认。当然,或许是限于文本史料,作者对大后方新闻工作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未能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总体布局、基本脉络、基本特征、影响因素、战时意义作出全面考察,稍显不足。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1937—1945)”的立项,则相应填补了前述研究的遗憾。该项目力求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进行全景式地系统总结,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初步考察自然也就包含在内。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及历史经验研究”的立项,更是为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学术支撑和理论支持。

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争取舆论话语权的技巧》(周定泰,2010)、《从〈救亡日报〉(桂林版)看中国共产党抗日舆论动员的策略》(徐健等,2013)、《抗战时期贵阳的社会舆论表达》(黄亦君,2013)、《抗战时期报纸新闻标题语言的计量语体分析——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为例》(赵雪等,2015)、《周恩来革命舆论宣传及对中国抗战之路的贡献——基于〈群众〉周刊的分析》(崔璇,2015)、《报刊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动员》(郑大华,2015)、《关于抗战时期舆论动员研究的思考》(朱从兵,201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研究》(来永玲,2017)、《抗战胜利前后重庆〈新华日报〉的舆论导向探析》(唐筱童,2017)、《媒介仪式与政治斗争——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及意义探析》(伍静,2018)、《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念的冲突与调适——对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考察》(王雪驹等,2018)等等,此类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不断的学术自觉中汇入到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

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体系中。这些成果,大多形成在201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时期,顺应了学术研究对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日渐注重科学性,能够将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有机融合,也契合了学术对研究方法的创新要求,可以从更多元的维度来提炼总结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其中,《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念的冲突与调适——对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考察》一文在文献史料方面的运用,以及《媒介仪式与政治斗争——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及意义探析》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都堪称近年来少有的新闻史研究佳作。

必须补充的是,未来在研究当中还有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所涉及的档案史料作出充分有效的前期整理。史学即史料学,除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已经完全数字化外,很多由我党间接掌控、外围影响的报刊,如中共四川省工委掌握的进步报刊有《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公开出版的党刊《南方》、中共昆明支部创办的刊物《前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合办的《战时知识》《文化岗位》,中共党员张熙和主编的广西学生军机关报《曙光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战通讯》《西北青年》《抗敌》《甘院学生》,中共贵州省委领导的《贵州学联》,中国共产党人把握的《新疆日报》等,都需要耐心收集、仔细整理。这些报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布局体系,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舆论影响力。而且,它们与中国共产党不尽相同的组织关系,也决定了它们本身不同的舆论策略和传播技巧。对这批材料的掌握,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史研究学术增长点的基础。

用“新闻舆论工作”来更新“新闻宣传工作”的研究视角,并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作出系统观察,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缘起与初衷。当前,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12]。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舆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那么,发掘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城市办报范式,探讨新闻媒体坚持党的领导,在树立党性原则的同时,提升在复杂舆论环境下的工作水平,就更能够凸显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课题最大的价值所在。

五、结语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循此逻辑,回顾这场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经验,不仅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抗战研究的明确要求,而且对当下新闻舆论工作的开展也会有所启示和裨益。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丁淦林. 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J]. 新闻大学, 1995.

- [3] 伍静. 党报的另一种传统——延安《解放日报》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比较及不同命运[J]. 新闻记者, 2015(11).
- [4] 陈晓静. 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D]. 安徽大学, 2016.
- [5] 金达凯. 中共宣传政策与运动[M]. (香港)近代史研究所, 1954.
- [6] 重庆市《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 四川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 新华日报史新著[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8.
- [7] 洪富忠. 抗战期间中共在大后方的媒体布局——以报刊为中心的考察[J]. 未刊稿.
- [8] 蔡斐. 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7).
- [9] 叶俊. 新闻宣传概念的历史及其终结[J]. 全球传媒学刊, 2016(4).
- [10] 唐绪军. 由"宣传"到"舆论"意味着什么?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4-29.
- [11] 张瑾.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
- [12] 马昌豹. 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新论探析[J]. 中国记者, 2016(3).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Rear Area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ai Fe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in the rear area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review of academic history, firstly, there are more researches on the work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nd less research on the work of rear area in terms of quantity. Secondly, on the research object, more scholars study the Xinhua Daily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other subjects.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researches, they tend to study the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instead of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At present, the conditions have already met the needs of systematically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the public opinion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ear area of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ar area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责任编辑:左福生]